

读书报专访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

四问《十三经注疏》汇校、点校

■本报记者 吴昉

□就古代典籍对社会文化的影响而言,“十三经”的影响超过任何古代典籍

□由学术界、出版界通力合作,完成《十三经注疏》的汇校、点校,出版一部“十三经”现代通行本,是适逢其时的学术文化盛事

□半个世纪前“二十四史”点校的模式尽管很难复制,但今天的条件也有很多方面远远优于当年

□总的说来,这项工作并不存在一个终极点,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

读书报:《十三经注疏》是我国古籍中的基本典籍,与“二十四史”构成传统典籍的骨干。我们知道,30年前,中华书局出版了“二十四史”点校本,这已成为中国出版史上的经典。为什么“十三经”没有做同样的工作?

徐俊:《十三经注疏》整理本是过去几代学人都曾计划要做的一件事。就古代典籍对社会文化的影响而言,“十三经”的影响超过任何古代典籍,顾颉刚先生称“中国二千余年来之文化莫不以此为中心而加以推扬”,所以在整理传刻方面,历来受到大家的重视。

单就现代古籍整理意义上的“十三经”整理而言,我们可以以顾颉刚先生为例来说明。早在1926年顾先生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助教的时候,就提出整理《十三经注疏》,包括校勘、标点、纂辑、索引四个方面,目标是“使学者对于宋以前之经说开卷了然”,“基础既固,自不难于堂构”(顾颉刚1926年5月《整理十三经注疏计划》)。次年顾先生就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之前,还曾致信胡适,计划请范文澜参加标点《十三经注疏》,重校“十三经”正文。1941年,顾先生在成都,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,受当时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委托,主持《十三经注疏》整理,顾先生提交了《整理十三经注疏工作计划书》,后因工作转移,未能完成。在顾先生1950年代日记中,“标点本十三经”、“十三经点校”也多次见于他的学术计划中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党和政府特别重视古代典籍的整理和出版。毛主席曾经说过,“从孔夫子到孙中山,我们应当给予总结,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”,强调剔除糟粕,吸收精华和“古为今用”。1954到1956年,在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下,由顾颉刚、聂崇岐、王崇武等12人组成标点小组,完成了《资治通鉴》的整理。1956年,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先生,在《人民日报》撰文,提出整理出版“面貌全新、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“二十四史”的建议,并满怀豪情地说

“这是千秋的事业”。“二十四史”点校从1958年启动,次年第一种《史记》出版。

那么,在此前后,是否有整理出版“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十三经”的动议呢?1958年,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,制订了《三至八年(1960—1967)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(草案)》,点校本“二十四史”列入规划,“十三经”则以清人注疏著作为主。1960年至1962年间,中华书局由傅彬然等牵头,吸收1930年代尹炎武(执笔)、1940年代顾颉刚等学者关于“十三经”整理的意见,制订了“十三经注疏”及清人注疏著作的整理方案,并在全国有关高校征求了意见。但最终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未能开展。

1971年,“二十四史”点校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,重新启动,由顾颉刚总其成。周总理派吴庆彤同志到他家看望,并转达总理对“二十四史”标点工作的重要指示。在另一次会议上,总理提出:“不但二十四史要标点,十三经也要标点。”(《光明日报》1979年3月6日)1979年,中华书局恢复独立建制后,即着手以“十三经清人注疏”丛刊的形式,对“十三经”重要注疏著作进行系统整理。

读书报:关于《十三经注疏》汇校、点校一事,山东大学与中华书局是什么时候开始联系的,过程如何?

徐俊:组织整理出版一部比肩点校本“二十四史”的“十三经”通行本,是中华书局多年规划和准备做的一个重大选题。中华书局与山东大学文史哲学科有着悠久的历史,“二十四史”点校本中的“南朝五史”就是山东大学王仲华、卢振华、张维华先生经过十余年整理完成的。十多年前,山东大学杜泽逊先生着手“宋本十三经汇编”,是国家古籍整理出版“十一五”重点规划项目,中华书局也是承担单位。2006年,我们在进行点校本“二十四史”修订的同时,也开始着手“十三经注疏”通行本的准备工作,包括体制制订、文献准备和学术

资源等方面,并与山东大学儒学院密切合作,多次研究磋商,确定了工作方案。项目已经列入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制订的“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”。我们认为由学术界、出版界通力合作,完成《十三经注疏》的汇校、点校,出版一部“十三经”现代通行本,是适逢其时的学术文化盛事。

读书报:“二十四史”点校本出版时,我们国家还是计划经济体制,中华书局就是国家古籍整理出版机构,加上由最高领导人发起,因此动员、组织全国学术资源非常便利。现在看来,这样的条件是无法复制的,这对《十三经注疏》的汇校、点校会有影响吗?

徐俊:当然,随着学术环境、出版环境的变化,半个世纪前“二十四史”点校的模式,现在看来已很难复制。但是,今天的条件,也有很多方面远远优于当年。比如,国家对文化工程的重视,虽然不再以行政指令的方式来推动,但在宏观规划、项目支持方面的力度大大超过过去任何一个时期;再比如,学术界几十年学术积累和专题研究的深入,文献资料的汇集和利用,也大大超过从前;新技术带来的便捷,也大大提高了工作的进程。另外,就本项目而言,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前期准备工作充分扎实,已确定的以“汇校本”为基础,最终形成“通行本”的工作方案,符合学理,符合古籍整理规范,也满足了目前学术界、社会文化界的基本需求。中华书局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,有一支优秀的编辑队伍和丰富的编辑经验,汇校工作主要由山东大学方面承担,通行本将在全国范围内遴选经学专家分别主持,多方通力合作,保证《十三经注疏》汇校本、通行本的顺利完成。

读书报:完成一部通行的《十三经注疏》点校本,目前的学术积累是否成熟?比如,有没有一些重大的学术争论难以形成共识,再比如,在未来可预计的一段时间里,会不会出现新的学术研

究突破,等等?

徐俊:关于《十三经注疏》的学术积累是不是能够构成当代《十三经注疏》整理,尤其是点校通行本的基础,我认为大体说来是能够构成整理通行本的基础的。“十三经”以及它的注疏在唐宋时期,事实上是科举考试的标准,在后来的历朝历代都没有停止研究,这种研究在清代达到高峰,《皇清经解》正续编、《清经解三编》大体集中了比较重要的成果,近几十年有新的方法以及发现的新材料,使得经学研究有新的进步,有关的成果也比较丰富,海内外发现的早期的版本比以往更多,使用也更方便,应该说条件已经相对成熟。点校首先是校,校要依赖不同的版本,尤其是早期的版本,这一点条件比前人优越。再就是断句,全部《十三经注疏》在乾隆年间已经有了比较好的断句本,当代学者没有很好利用,近一二十年间,学术界在标点方面也做出了较好的成绩,都是可资借鉴的。因此,断句方面也有了较好的积累。总体上看,需要进一步努力的仍然在校勘方面,条件较好,但是工作量巨大,需要一定的周期,不能搞大跃进,只要方法得当,依靠专家,这项工作是可以顺利完成并且达到预期的目标的。当然,“十三经”、“二十四史”都存在悬而未决的问题,先秦两汉的古书问题非常多,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不做点校工作,古籍整理一般采取谨慎的方法,对于有疑问的地方,可以沿用旧说,不勉强做新解,这种妥当的做法是古籍整理界公认的,因此也不会成为当代整理通行本的障碍。至于今后有新的、更好的研究成果,这在所有的古籍整理中都是存在的,那就应当在适当的时机做修订工作。“二十四史”点校本正在修订,就是基于这方面的原因。因为“二十四史”点校本问世以后,商榷、订误的文章发表的不少,可以参校通行本,这样的通行本适合于一般研究者、一般读者阅读使用。但是,确定异文的是非直接关系到对经典的理解,而对经典的理解从来都存在一定的分歧,因此,所谓通行本是极其严肃的学术成果,必须由经学造诣较深的专家承担整理任务,并且应当聘请专家委员会做最后的审定工作,从而形成代表当代国家水平的最好的版本。《十三经注疏》点校通行本工作是《十三经注疏》整理计划的最终成果,应当分别聘请有名望的专家承担点校工作,点校的基础是《十三经注疏汇校》。点校工作与汇校工作可以交叉进行。

徐俊:关于《十三经注疏》汇校、点校一事,山东大学与中华书局是什么时候开始联系的,过程如何?

徐俊:组织整理出版一部比肩点校本“二十四史”的“十三经”通行本,是中华书局多年规划和准备做的一个重大选题。中华书局与山东大学文史哲学科有着悠久的历史,“二十四史”点校本中的“南朝五史”就是山东大学王仲华、卢振华、张维华先生经过十余年整理完成的。十多年前,山东大学杜泽逊先生着手“宋本十三经汇编”,是国家古籍整理出版“十一五”重点规划项目,中华书局也是承担单位。2006年,我们在进行点校本“二十四史”修订的同时,也开始着手“十三经注疏”通行本的准备工作,包括体制制订、文献准备和学术资源等方面,并与山东大学儒学院密切合作,多次研究磋商,确定了工作方案。项目已经列入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制订的“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”。我们认为由学术界、出版界通力合作,完成《十三经注疏》的汇校、点校,出版一部“十三经”现代通行本,是适逢其时的学术文化盛事。

徐俊:当然,随着学术环境、出版环境的变化,半个世纪前“二十四史”点校的模式,现在看来已很难复制。但是,今天的条件,也有很多方面远远优于当年。比如,国家对文化工程的重视,虽然不再以行政指令的方式来推动,但在宏观规划、项目支持方面的力度大大超过过去任何一个时期;再比如,学术界几十年学术积累和专题研究的深入,文献资料的汇集和利用,也大大超过从前;新技术带来的便捷,也大大提高了工作的进程。另外,就本项目而言,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前期准备工作充分扎实,已确定的以“汇校本”为基础,最终形成“通行本”的工作方案,符合学理,符合古籍整理规范,也满足了目前学术界、社会文化界的基本需求。中华书局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,有一支优秀的编辑队伍和丰富的编辑经验,汇校工作主要由山东大学方面承担,通行本将在全国范围内遴选经学专家分别主持,多方通力合作,保证《十三经注疏》汇校本、通行本的顺利完成。

徐俊:当然,随着学术环境、出版环境的变化,半个世纪前“二十四史”点校的模式,现在看来已很难复制。但是,今天的条件,也有很多方面远远优于当年。比如,国家对文化工程的重视,虽然不再以行政指令的方式来推动,但在宏观规划、项目支持方面的力度大大超过过去任何一个时期;再比如,学术界几十年学术积累和专题研究的深入,文献资料的汇集和利用,也大大超过从前;新技术带来的便捷,也大大提高了工作的进程。另外,就本项目而言,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前期准备工作充分扎实,已确定的以“汇校本”为基础,最终形成“通行本”的工作方案,符合学理,符合古籍整理规范,也满足了目前学术界、社会文化界的基本需求。中华书局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,有一支优秀的编辑队伍和丰富的编辑经验,汇校工作主要由山东大学方面承担,通行本将在全国范围内遴选经学专家分别主持,多方通力合作,保证《十三经注疏》汇校本、通行本的顺利完成。

徐俊:当然,随着学术环境、出版环境的变化,半个世纪前“二十四史”点校的模式,现在看来已很难复制。但是,今天的条件,也有很多方面远远优于当年。比如,国家对文化工程的重视,虽然不再以行政指令的方式来推动,但在宏观规划、项目支持方面的力度大大超过过去任何一个时期;再比如,学术界几十年学术积累和专题研究的深入,文献资料的汇集和利用,也大大超过从前;新技术带来的便捷,也大大提高了工作的进程。另外,就本项目而言,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前期准备工作充分扎实,已确定的以“汇校本”为基础,最终形成“通行本”的工作方案,符合学理,符合古籍整理规范,也满足了目前学术界、社会文化界的基本需求。中华书局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,有一支优秀的编辑队伍和丰富的编辑经验,汇校工作主要由山东大学方面承担,通行本将在全国范围内遴选经学专家分别主持,多方通力合作,保证《十三经注疏》汇校本、通行本的顺利完成。

徐俊:当然,随着学术环境、出版环境的变化,半个世纪前“二十四史”点校的模式,现在看来已很难复制。但是,今天的条件,也有很多方面远远优于当年。比如,国家对文化工程的重视,虽然不再以行政指令的方式来推动,但在宏观规划、项目支持方面的力度大大超过过去任何一个时期;再比如,学术界几十年学术积累和专题研究的深入,文献资料的汇集和利用,也大大超过从前;新技术带来的便捷,也大大提高了工作的进程。另外,就本项目而言,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前期准备工作充分扎实,已确定的以“汇校本”为基础,最终形成“通行本”的工作方案,符合学理,符合古籍整理规范,也满足了目前学术界、社会文化界的基本需求。中华书局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,有一支优秀的编辑队伍和丰富的编辑经验,汇校工作主要由山东大学方面承担,通行本将在全国范围内遴选经学专家分别主持,多方通力合作,保证《十三经注疏》汇校本、通行本的顺利完成。

徐俊:当然,随着学术环境、出版环境的变化,半个世纪前“二十四史”点校的模式,现在看来已很难复制。但是,今天的条件,也有很多方面远远优于当年。比如,国家对文化工程的重视,虽然不再以行政指令的方式来推动,但在宏观规划、项目支持方面的力度大大超过过去任何一个时期;再比如,学术界几十年学术积累和专题研究的深入,文献资料的汇集和利用,也大大超过从前;新技术带来的便捷,也大大提高了工作的进程。另外,就本项目而言,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前期准备工作充分扎实,已确定的以“汇校本”为基础,最终形成“通行本”的工作方案,符合学理,符合古籍整理规范,也满足了目前学术界、社会文化界的基本需求。中华书局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,有一支优秀的编辑队伍和丰富的编辑经验,汇校工作主要由山东大学方面承担,通行本将在全国范围内遴选经学专家分别主持,多方通力合作,保证《十三经注疏》汇校本、通行本的顺利完成。

徐俊:当然,随着学术环境、出版环境的变化,半个世纪前“二十四史”点校的模式,现在看来已很难复制。但是,今天的条件,也有很多方面远远优于当年。比如,国家对文化工程的重视,虽然不再以行政指令的方式来推动,但在宏观规划、项目支持方面的力度大大超过过去任何一个时期;再比如,学术界几十年学术积累和专题研究的深入,文献资料的汇集和利用,也大大超过从前;新技术带来的便捷,也大大提高了工作的进程。另外,就本项目而言,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前期准备工作充分扎实,已确定的以“汇校本”为基础,最终形成“通行本”的工作方案,符合学理,符合古籍整理规范,也满足了目前学术界、社会文化界的基本需求。中华书局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,有一支优秀的编辑队伍和丰富的编辑经验,汇校工作主要由山东大学方面承担,通行本将在全国范围内遴选经学专家分别主持,多方通力合作,保证《十三经注疏》汇校本、通行本的顺利完成。

徐俊:当然,随着学术环境、出版环境的变化,半个世纪前“二十四史”点校的模式,现在看来已很难复制。但是,今天的条件,也有很多方面远远优于当年。比如,国家对文化工程的重视,虽然不再以行政指令的方式来推动,但在宏观规划、项目支持方面的力度大大超过过去任何一个时期;再比如,学术界几十年学术积累和专题研究的深入,文献资料的汇集和利用,也大大超过从前;新技术带来的便捷,也大大提高了工作的进程。另外,就本项目而言,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前期准备工作充分扎实,已确定的以“汇校本”为基础,最终形成“通行本”的工作方案,符合学理,符合古籍整理规范,也满足了目前学术界、社会文化界的基本需求。中华书局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,有一支优秀的编辑队伍和丰富的编辑经验,汇校工作主要由山东大学方面承担,通行本将在全国范围内遴选经学专家分别主持,多方通力合作,保证《十三经注疏》汇校本、通行本的顺利完成。

徐俊:当然,随着学术环境、出版环境的变化,半个世纪前“二十四史”点校的模式,现在看来已很难复制。但是,今天的条件,也有很多方面远远优于当年。比如,国家对文化工程的重视,虽然不再以行政指令的方式来推动,但在宏观规划、项目支持方面的力度大大超过过去任何一个时期;再比如,学术界几十年学术积累和专题研究的深入,文献资料的汇集和利用,也大大超过从前;新技术带来的便捷,也大大提高了工作的进程。另外,就本项目而言,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前期准备工作充分扎实,已确定的以“汇校本”为基础,最终形成“通行本”的工作方案,符合学理,符合古籍整理规范,也满足了目前学术界、社会文化界的基本需求。中华书局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,有一支优秀的编辑队伍和丰富的编辑经验,汇校工作主要由山东大学方面承担,通行本将在全国范围内遴选经学专家分别主持,多方通力合作,保证《十三经注疏》汇校本、通行本的顺利完成。

徐俊:当然,随着学术环境、出版环境的变化,半个世纪前“二十四史”点校的模式,现在看来已很难复制。但是,今天的条件,也有很多方面远远优于当年。比如,国家对文化工程的重视,虽然不再以行政指令的方式来推动,但在宏观规划、项目支持方面的力度大大超过过去任何一个时期;再比如,学术界几十年学术积累和专题研究的深入,文献资料的汇集和利用,也大大超过从前;新技术带来的便捷,也大大提高了工作的进程。另外,就本项目而言,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前期准备工作充分扎实,已确定的以“汇校本”为基础,最终形成“通行本”的工作方案,符合学理,符合古籍整理规范,也满足了目前学术界、社会文化界的基本需求。中华书局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,有一支优秀的编辑队伍和丰富的编辑经验,汇校工作主要由山东大学方面承担,通行本将在全国范围内遴选经学专家分别主持,多方通力合作,保证《十三经注疏》汇校本、通行本的顺利完成。

徐俊:当然,随着学术环境、出版环境的变化,半个世纪前“二十四史”点校的模式,现在看来已很难复制。但是,今天的条件,也有很多方面远远优于当年。比如,国家对文化工程的重视,虽然不再以行政指令的方式来推动,但在宏观规划、项目支持方面的力度大大超过过去任何一个时期;再比如,学术界几十年学术积累和专题研究的深入,文献资料的汇集和利用,也大大超过从前;新技术带来的便捷,也大大提高了工作的进程。另外,就本项目而言,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前期准备工作充分扎实,已确定的以“汇校本”为基础,最终形成“通行本”的工作方案,符合学理,符合古籍整理规范,也满足了目前学术界、社会文化界的基本需求。中华书局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,有一支优秀的编辑队伍和丰富的编辑经验,汇校工作主要由山东大学方面承担,通行本将在全国范围内遴选经学专家分别主持,多方通力合作,保证《十三经注疏》汇校本、通行本的顺利完成。

关于《十三经注疏》

《十三经注疏》是我国古籍中的基本典籍,是中国经学史上汉唐经学成就的代表,与“二十四史”构成传统典籍的骨干,历来受到研究学习中国传统学术者的最大重视。因此,《十三经注疏》、“二十四史”的系统整理、刊行,历来是国家高度重视的课题。尤其是明清两代,朝廷主持刊行《十三经注疏》、“二十四史”(明代“二十一史”)已形成传统。明代南京国子监有系统修版印行的《十三经注疏》,北京国子监有重新刊行的《十三经注疏》(《四库全书荟要》本一般认为与《四库全书》本为同一系统)、“二十四史”,也是精加校勘、自成系统的本子。嘉庆间,江西巡抚阮元在南昌刻印了《重校宋本十三经注疏》。乾隆殿本和嘉庆阮元本两大系统的《十三经注疏》都附有校勘记,从而形成了经典整理出版的模式,即详加校勘,然后刊印,附有校勘记。嘉庆以来近200年间,学术界使用的通行本《十三经注疏》仍是阮元本。随着近年《四库全书》影印行世,阮本之外,殿本和库本也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。

建国后,“二十四史”、《资治通鉴》已经由国家组织优秀学者整理出了迄今最好的点校本,由中华书局出版,成为具有时代特点的通行本。“二十四史”至今还在进一步完善。这说明正经、正史的整理工作是一项复杂的、需要长期努力的工作。遗憾的是,由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,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色的《十三经注疏》的版本没有和“二十四史”同时产生。近年学术界和出版界也做出了不少努力,出版了若干点校本,但是这项工作仍有进一步努力完善的余地。

儒家经书在流传过程中,经历了白文无注阶段、经注合一阶段、经注疏合一阶段、经注疏音义合一阶段。目前通行的《十三经注疏》总体上是经注疏音义合一的文本。学界认为,整理校勘“十三经”应当根据版本演变的阶段分别进行,欲追寻经学之面目,应以较古之白文本为底本(现存唐石经本、宋版白文八经本虽为白文无注,实出于经注本而删其注文,非单经原本也),汇校古本系统,包括出土文献、古书引经等,并且参校《释文》、经注本、注疏本。欲追寻经注本之面目,应以较古之经注本为底本,汇校古本系统(唐石经应归入经注本系统),包括利用疏文以校经注(王锜先生《礼记郑注汇校》可仿效)。欲追寻《释文》之面目,应以单行宋版《经典释文》为底本,汇校旧刻旧钞本,包括经注音义本、经注疏音义本内之音义部分(黄焯先生《经典释文汇校》可仿效)。欲整理《十三经注疏》通行本,则应选择单疏本、经注疏本、经注疏音义本进行校勘,而以相对完整之经注疏音义本为底本,否则经注疏音义之异文或无可附俚。盖注疏本之整理与旨在恢复经书古本面貌之校勘实非一途,不可兼顾。白文原始文本已难求其全,故白文原始面貌之探求大抵只能零星从事,难成系统成果。经注本之汇校、注疏本之汇校均有形成独立系统的条件。

过去的校勘学家和经学家,把校勘的主要精力用于追寻经书及古注的原貌上,在出土文献、敦煌残卷、传世古写本、石经本、古刻本以及类书、古注引经等材料的基础上,作出了丰富的成果,总结出若干经书本演变的规律,为厘清经书流变史作出了巨大贡献。但是对唐宋时期出现的“疏”,则校勘工作相对较少。已有的成果主要是:乾隆武英殿本考证、《四库全书》本考证、阮元《十三经注疏校勘记》、汪文台《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识语》、孙诒让《十三经注疏校记》、刘承干若干单疏本校勘记等,其中阮元《校勘记》成就最大。但限于当时的条件,阮元通校本的本子为元刊明修十行本、李元阳刻本、北监本、毛本四个版本,其他单疏本、八行本、南宋十行本,大量没有直接校勘。例如《周易注疏》,阮元《校勘记》未见最早的宋刊单疏本《周易正义》十四卷,仅据钱遵王校本,而钱校本包括单疏本一种、单注本二种、注疏本一种,无法区别,阮元笼统地称为“钱校本”,单疏本的面貌无法体现。阮元也没有见到传世较早的南宋浙东茶盐司刻《周易注疏》十三卷,仅据卢文弨《传校明末钱求赤校影宋抄本,辗转转录,难以保证校勘记的客观性。同时,阮元没有对校清乾隆武英殿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和《四库全书》本,而这两个乾隆本都是精加校勘并且附有考证(即校勘记)的版本。例如《四库全书荟要》本《周易经传注疏》,据其提要,是“以内府刊本缮录,据宋槧本、明国子监本、毛晋汲古阁本及诸家所赠宋本恭校”的。而在今天,南宋刻单疏本有民国间傅增湘影印本,宋刻八行本有《古逸丛书三编》影印本。合单疏本、八行本、元刊十行本、明嘉靖李元阳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、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、明毛晋汲古阁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本、清乾隆武英殿本、清乾隆《四库全书》本、清嘉庆阮元刻本等九种重要版本形成《周易注疏汇校》,就可以大大弥补阮元的《周易注疏校勘记》,从而真正将《周易注疏》宋代以来的主要版本的文字异同汇为一编,为进一步整理《周易注疏》更好的通行本打下坚实的基础。其他各经注疏,阮元《校勘记》在网罗宋元旧刊、利用乾隆善本方面也普遍存在严重的不足。

关于《十三经注疏》汇校、点校

《十三经注疏汇校》

《十三经注疏》传世版本,大体说来有九个系统:(一)宋刊单疏本,(二)宋刊八行本,(三)宋元刊十行本,(四)明嘉靖李元阳刊本,(五)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刊本,(六)明末毛氏汲古阁刊本,(七)清乾隆武英殿刊本,(八)清乾隆修《四库全书》本,(九)清嘉庆阮元南昌刻本。汇校《十三经注疏》,这九大系统的版本应当通校,所有异文均应忠实地写入校勘记,形成《十三经注疏校勘记长编》。《四库全书荟要》本是不是可以断定为独立的版本系统,要通过校勘来确定,所以在实际工作中要对《荟要》本作专门的校勘。其他注疏系统的重要版本,例如《尚书注疏》蒙古刻本,《论语注疏》宋蜀刻本、元元贞平水本,《仪礼注疏》明陈凤梧刻本、嘉靖应一初本、清张敦仁刻本,南宋刘叔刚一径堂刻《毛诗注疏》(《春秋左传注疏》,南宋福建刻十行本《监本附音春秋注疏》等,也要列入全面对校的范围。

《十三经注疏》最早的版本系统为“单疏”系统,传世有宋刊本(或传抄、重刊本)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公羊》、《梁》、《尔雅》等,面貌最古。

另一较早的版本系统为经注疏合刻本,即南宋浙东茶盐司八行大字本,传世有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春秋左传》(绍兴府刊)、

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。

第三大系统是十行本,又称附释音《十三经注疏》,南宋建刊,元有翻版,明南监据以修版,阮元《十三经注疏》所从出。

十行本之后,有明嘉靖李元阳刻本、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本、明毛晋汲古阁刻本、清乾隆武英殿刻本、清乾隆《四库全书》本、清嘉庆阮元南昌刻本,都以十行本为祖本。

本来元刊明修十行本,亦即明清各本的祖本,适合作为《汇校》的底本,但就目前情况看,存在以下问题:一、“中华再造善本”影印的北京文物局藏《十三经注疏》十行本,一半以上为明正德、嘉靖修版。根据前人的校勘,重修版错误校多,并且有阙字。二、其中《仪礼》不是注疏本。因此,无法作为《汇校》的底本。后来的版本,李元阳刻本出于元刊明修十行本,校勘不精,阙字大都未能填补。汲古阁本出于北监本,校勘不精,质量在北监本之下。乾隆武英殿本文字校勘方面胜于北监,其胜处往往与宋本合,大抵参考了何焯校本,并且加了句读,是较为精善的版本,但是为了行文流畅,对疏文引用各书偶有改动,各篇解释篇名的疏文原在各篇,殿本统一移到各书卷首,疏文开头“某某至某某”的提示语也被删去。四库本又据殿本而再加校勘,均稍失原貌。则可考虑作底本的只有明万历北监本和清嘉庆阮元刻本。阮元刻本附校勘记,比较通行易

得,如果选为底本,其校勘记是否保留,颇难定夺。如不予保留,则所谓阮本实际不全,如予保留,则校勘记外再加汇校,不无叠床架屋之病。基于以上考虑,选用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本作为底本,似较妥当。北京国子监本源于南监重修十行本,根据前人的研究结果,当时曾据宋版校正,改正错字,填补阙文,属于较为完善的官版。明崇祯年间曾对初版进行修补,修补版错误较多,阮元校勘记所利用的明北监本为修补本,所以阮元对北监本评价很低。这是一种误解。

《十三经注疏汇校》的具体工作步骤是:以北监本与单疏本、八行本、十行本、李元阳本、汲古阁本、武英殿本、《四库》本、阮元本分头对校,形成八份校勘记。再将八份校勘记合成一份校勘记,也就是所谓的“汇校”。

历史上形成的《十三经注疏》的校勘成果,如武英殿本《考证》、《四库全书考证》、日本山井鼎《七经孟子考文》及物观《补遗》、清乾隆《十三经注疏正字》、阮元《十三经注疏校勘记》、孙诒让《十三经注疏校勘记》、刘承干刻单疏本校勘记等,其内容有溢出于九大版本系统之外的异文,以及关于文字是非的判断,择要录于各条校勘记之末,作为参考。

《十三经注疏汇校》出版的形式是:正文影印明北监刻《十三经注疏》初印本,并参考乾隆武英殿刻《十三经注疏》之句读,加以断句,以便读者。《汇校》列在每卷之后。每条校记均注明原本卷几第几页第几